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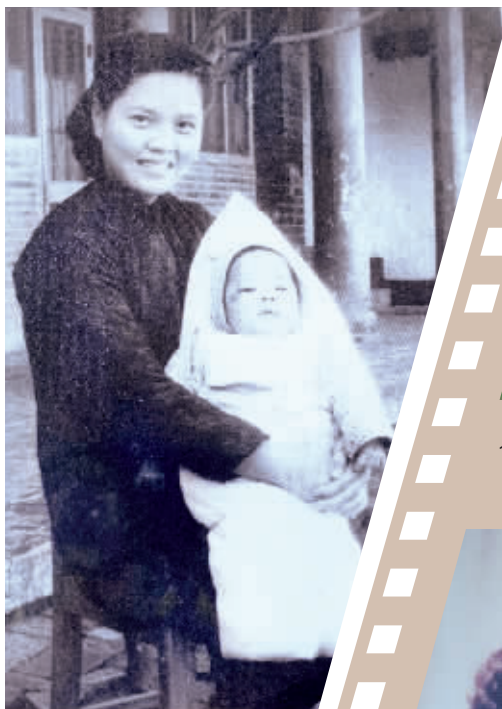


昔日通宵缝纫养家,如今熬夜看球追剧

“高龄少女”童继淑:党带领我们过上了好日子

人物档案

童继淑,1920年农历5月24日出生于重庆,长沙市芙蓉区一缝纫厂退休职工。



童继淑抱着大女儿王立莉在西安合影。(资料图)



81岁的王立莉(左)与101岁的童继淑。



70年前,童继淑和丈夫王业勤在广州合影留念。(资料图)

长寿秘诀

闲不住,想得开

总结长寿秘诀,童继淑伸出两根手指头:“一是闲不住,二是想得开。”

每天饭后三百步,她几十年从未间断。

骨子里的乐观豁达,也支撑着她走过漫长人生。

1974年,她先后痛失长子和长女婿。“她最先挺过来的,鼓励我们一起从悲伤中走出来。”大女儿王立莉说。

2006年,老人发烧住院。三四名医生围在一起看她的肺部CT片子,正踌躇着如何措辞才能让老人宽心。她冷不丁上去问:是癌症不?是癌症你们就直说,人活86岁也够了。医生吓了一跳,全乐了。

“开心是一天,不开心也是一天,那就不如开心过。困难只是暂时的,凡事要朝前看。”记者离开前,童继淑拉着记者的手说。

这双手,历经百年风霜,却温软有力。

“大裁缝”

长沙裁缝圈无人不知
针线世界见证社会变革

上世纪60年代时,响应国家号召,童继淑召集街道上的困难户们组建了东风缝纫加工厂。1978年改革开放后,东风缝纫加工厂承包了当时长沙市第一、第二服装厂的外贸服装业务。

在缝纫加工厂,她负责教授裁缝技术与质量把关。“每次都是我先搭配好颜色和花样,把样衣做出来,工人姐妹们再照着样衣做。”

由于绣工扎实,设计新颖,童继淑还被选入湘绣大楼当过一段时间“绣娘”,专做出口产品。“别人都说我绣的花栩栩如生,绣的娃娃眼睛会传神。”童继淑的名字,在当时的长沙裁缝圈里无人不知。

从街道小作坊,到国企代工厂;从自学绣工,到承制外贸产品,乘着改革开放的东风,童继淑靠着手艺让一家人过上了好日子。而她手里的工具,也从最初的一针一线,先是变成了手摇式缝纫机,又更新成脚踏式缝纫机、电动缝纫机。

针线世界里忙活了几十年,童继淑见证了长沙街头的潮流穿搭。从计划经济时代单调的蓝绿工装,到改革开放之后的喇叭裤、花裙子,再到现在百花齐放的穿搭风。

“现在流行复古,看看街头,也有不少年轻人喜欢‘奶奶风’。潮流反复,你们开心就好。”童继淑笑着说。

“老顽童”

游山玩水背包客
通宵达旦电视迷

在王立莉眼中,母亲童继淑是一位“新女性”,活得随心所欲。“年轻时,别人包办婚姻,她追求自由恋爱。年老了,别人深居简出,她风风火火。”

1993年大女儿王立莉退休后,73岁的童继淑便和女儿开启了“旅游人生”。秦皇岛、北戴河、山海关、崂山、孔庙、青岛、威海、烟台、衡山、张家界、凤凰、常德桃花源……87岁高龄时,童继淑还不靠搀扶登上了泰山之巅。

“以前绿皮火车慢慢摇,去哪里都是大半天。飞机颠上颠下,坐着担惊受怕。现在出门,高铁又快又舒服,飞机又大又平稳。”旅游时的童继淑也是个“背包客”,双肩包、墨镜、帽子是标准搭配,走起路来不比年轻人慢。

家里接通网络电视后,童继淑喜欢和女儿一起追剧。最喜欢追抗战类的电视剧,其次是悬疑类,一追就到半夜。

童继淑追剧,王立莉也只能陪看。一次,老太太实在入迷,已到凌晨两点,王立莉试探性地问,“现在该睡觉了吧?”老太太起身跑到窗边,“你看对楼还有灯亮着,他家肯定也还在看电视。”于是返身落座继续看,第二天睡懒觉。

童继淑还有个特别的爱好,看球赛。今年6月20日,世界女排联赛,中国女排对阵美国女排。“那天比赛是六点钟开始,她让我点个外卖,说做饭会耽误看球。”王立莉用手机记录下了母亲看球时全情投入的模样。“她看球时,中国队得分了就鼓掌,丢球了会拍桌子拍大腿。最近欧洲杯,又开始看球,熬夜比我精神还好。”

7月3日,童继淑将迎来自己的101周岁生日。问及心愿,童继淑笑着说,“我活了一百岁,从熬难日子到过好日子,经历了很多关口,是党带领我们过上了好日子。吃水不忘挖井人,我祝愿党的事业越来越兴旺,祝愿国家越来越强大。”

上午九点半,窗帘都快遮不住阳光时,童继淑老人起床了。“这一觉睡舒服了,今晚我倒要看看凶手到底是谁。”前一晚追电视剧《刑侦日记》到凌晨,老太太精神不减。

这个百岁老人的身体里,住着一个少女的灵魂:热衷熬夜追剧看球,也欢喜于背包远游旅行。

兵荒马乱的战争年代,她为了活着而活;物资匮乏的困难时期,她为了儿女而活;如今国盛民安,她开始为自己而活。(扫码看二维码看视频)

■记者 周可
实习生 赵小晴
图/视频 何佳洁



“苦难日”

养五个孩子,通宵做零工

老人的卧房,飘着淡淡的阳光香气,那是新晒的被子、衣服散发出来的气味。翻开床头柜上的两本厚相册,她的百年人生就在这股光影的芳香中流淌开来。

1920年,童继淑出生于重庆一个中产之家,家教很严,而她却并不是一个听话的乖乖女。

“家里要给我缠小脚、打耳洞,我都溜走了。媒人要给我介绍有钱的少爷,我也不见。”童继淑说,19岁那年,她遇到了自己的“真命天子”王业勤,“他大我四岁,江苏人,是复旦大学的高材生,外语说得好。”

1940年,两人喜结连理。随后,第一个孩子王立莉出生。当时的重庆,正遭受着日寇轮番轰炸。亲眼目睹过“六·五”隧道惨案,童继淑一听到防空警报,就抱着还在襁褓里的女儿往防空洞跑,“那时真的造孽,兵荒马乱,死了好多人,我们也吃不饱饭。”那段昏暗的战乱时光,让童继淑沟壑纵横的眼角泛起泪光。

1953年的中国,已是太平天下。丈夫王业勤在广西工作,童继淑则带着孩子们定居长沙。

彼时,童继淑在居住的浏正街街道当民政委员,靠着工资和丈夫每月寄回家的20元钱,养活五个孩子。

“我当时一个人带五个孩子,生活费不够,就自学裁缝绣工,下班后做点手工活,补贴家用。”童继淑笑着说。

老人的豁达一笑,在大女儿王立莉眼里却都是心酸。“那时候妈妈经常接织牛毛帽子的活,1毛6分钱一顶。有时我起夜,天都蒙蒙亮了,妈妈还在煤油灯下织帽子。”

生活费短缺的事,最后由组织出面解决了。“街道党委看她太辛苦,就给我父亲单位写信,每月在工资里给我父亲增加了20余元的补贴,同时还出面联系学校减免了我部分的学费。”同样经历过战乱的王立莉说,她一辈子感念组织的恩情。